

我的田野經驗： 田野調查與理論假設的辯證發展

洪惟仁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約聘助理研究員

田野工作是一種吃力不討好的工作。爲什麼說吃力？跑田野當然比坐在書房吹冷氣找資料辛苦了，這不必說；爲什麼說不討好？現在有興趣搞社會科學的動輒說自己在做「田野調查」，但東西出來了，行家一看，咦？田野調查怎麼這樣做的？以方言調查來說，第一個人家會懷疑，你的審音能力如何？你的資料怎麼取得的？發音人有代表性嗎？如果這些都沒交待清楚，那就很可能得不到學界的信任。如此一來，我們做得再多也等於廢紙，甚至比廢紙還具污染性。其次，即使你深具田野經驗，你所做的成果深受學界信任，如果你本身沒有深刻的理論修養，缺乏現象的解釋能力，那麼你只是在替別人做嫁衣裳罷了，你替學界提供良好的資訊服務，但你也一定能夠得到名位。由以上兩個理由，所以我說田野工作吃力不討好。

不過，無論如何，田野工作仍是最基本的工作，不重視田野資料而空談理論，在學界，特別是語言學界，不止是大有人在，簡直是普遍現象。那些空談理論，或硬套理論，甚至爲了滿足理論的邏輯推衍而抹殺現象、曲解現象的學術論文，到頭來也一定只是廢紙一堆。

這幾年的研究，使我深深感到田野工作、田野資料、和理論素養，都是不可偏廢的。但理論和田野工作，如果可以分立的話，我以為田野工作比理論素養重要得多。因爲紀錄現象本身就是貢獻了。現象是瞬息萬變的，今天不紀錄下來，明天就來不及了。但理論是現象的歸納，歸納的現象越多，理論的含蓋面越廣，所以理論明天再做還來得及，並且，最好明天再做。

但這不是說田野工作完全不需要理論指導。我想兩者應該具有相輔相成的辯證關係。現象歸納出理論，理論反過來指導現象的發掘。

閩南語的研究史印證了這些經驗。譬如西方傳教士及戰前的日本語言學者曾經爲閩南語，尤其是廈門音留下豐富而寶貴的文獻資料。然而這些資料多半是一些並非具有現代語言學理論素養的學者所作成，難免受到學者的輕視。於是許多學者繼續做方言調查。現在我們根據現代方言調查成果，反過來評估戰前的文獻資料，我們就可以清楚明白哪些資料是可以直接利用的，哪些是需要過濾、澄清或重新定位的。過去所發表的文獻資料中，經過分析結果，我們發現了一些閩南語的對應規律，但同時也給我們一些困惑，爲了解釋這些困惑，於是我們又需要去做更細密的田野工作，尋找解決問題的線索。我舉一些小小的例子。

杜嘉德(1873)字典曾提過漳州音和廈門音有 ue: e、e:ue 這類對調的對應關係，王士元(王士元1969)注意到董同龢(董同龢1960: 997-1010)也提供同類的韻母對應關係，如：

	龍溪	廈門
火歲皮	ue	e
雞鞋犁	e	ue

於是王士元提出一個所謂音韻反轉 (flip-flop) 理論，認為廈門或漳州可能忽然同時把兩類字的開合口對調了。他說這是一個違反語言演變規律的另一種「規律」。

到底它能不能成立呢？理論可能催促我們去尋找答案。於是我們從更多的田野資料和文獻中找到這樣的對應關係。茲將我們調查所得資料及擬測的閩南祖語 (PH) 對照如下：

	汐止	泉州	廈門	台南	漳浦	潮州	PH
火歲皮	ə	ə	e	ue	ue	ue	*uə
雞鞋犁	æ	ue	ue	e	ei	oi	*əi

利用歷史語言學的比較構擬法，我們擬出閩南祖語，從而發現廈門方言音韻反轉的現象原來是經由二次音變的結果，一次是喪失了合口介音，一次是新生了合口介音，兩次音韻變化的結果排比起來，就好像是音韻在反轉一樣。茲將廈門音的變化軌跡擬測如下(括弧內指仍保存此音的現代方言)：

火歲皮 *uə → ə (泉州) → e (廈門)
 雞鞋犁 *əi → æ (汐止) → ue (泉州、廈門)

這樣一來，王士元的音韻反轉論便無法成立了。我們在這裏是以更多的田野資料推翻了理論假設。

然而我們重新建立的新理論假設，使我們期待閩南語或閩方言出現這樣的讀音：

火 huə 歲 huə 皮 phuə
 雞 kəi 鞋 əi 犁 ləi

如果有這樣的方言，便證明了我們的假設是正確的。否則，這個假設將只能是一個合理的假設而已。

於是，理論正引導著我們下一步的田野工作所應注意的方向。

田野工作永遠是不怕做得太多的。做得越多，不止發現更多的資料，也給我們更多的經驗，改進我們的研究方法或研究態度。

過去研究漢語方言的人，交待方言點只提到「縣」，比如董同龢〈四個閩南方言〉(董

同龢 1960) 記錄了廈門、晉江、龍溪、揭陽四個縣市；〈記台灣的一個閩南方言〉(董同龢 1967) 記錄了台北方言。中嶋幹起《閩語東山島基礎語彙集》(中嶋幹起 1977) 紀錄漳州的東山方言，但都沒有交待發音人代表方言點更詳細的資料，比如鄉鎮、村里……。

這樣的態度是假設同一縣內沒有方言差。然而細密的閩南語方言調查結果告訴我們，這種假設是錯的。以台北為例。(董同龢 1967) 說他所記的是「台北」的閩南語，並斷言整個台北都是這樣的口音。也許因為這個態度，使他認為沒有必要交待更詳細的代表點資料。然而經過我們更細密的調查，我們發現「台北」——不管是台北縣、台北市都有相當複雜的方言現象，台北不是一個單純的方言點。舉現在的台北市區老派方言為例：

士林	大稻埕	艋舺	南港
雞	ke	kue	kue kəe
火	hue	he	hə hə

再舉東山方言為例。筆者有一次坐計程車和司機聊天，發覺他的發音非常奇怪，比如他說「馬」 be^{41} ，「街」 ke^{44} ，這明明是漳州音。可是又說「魚」 $h\dot{u}^{13}$ ，「豬」 $t\dot{u}^{44}$ ，這是典型的泉州音。這是怎麼了？我問他那裏人？他答說「東山」。我心想，這怎麼可能？漳州怎麼會有 $h\dot{u}^{13}$ 這樣的「泉州音」？

去年(1990)我參加汕頭第二次閩方言研討會，碰到一個年輕的方言學者高然先生。據他對東山方言的調查結果，東山島有四種口音，我所聽到的那種東山方言是位於東山島北部的一個小方言點。

後來根據進一步的資料檢索，知道詔安也有這樣的一 \dot{u} 韻母。這不得不使我們斷定在漳州西部，一部份方言的這個一 \dot{u} 韻母，保存著古代漳州音 hi (喜) 和 $h\dot{u}$ (許) 的區別。這個區別在現代潮州音及大部份泉州音都仍然保存著，但大部份現代漳州音都混同為 hi 了，只有東山、詔安部份小方言點還保存著古漳州音。

這些經驗告訴我們，過去的研究態度太過粗疏。田野工作與理論假設的辯證發展，不但提昇了我們的理論層次，同時也改進了我們的研究方法與研究態度。

參考書目

中嶋幹起

1977 閩語東山島基礎語彙集。東京外國語大學 アジア、アフリカ 言語文化研究所。

董同龢

1959 四個閩南方言，史語所集刊 30 本。

1967 記台灣的一種閩南語，史語所集刊 24 本。

王士元 (William S.T. Wang)

1969 "Competing change as a cause of Residue" *Language* 45 (1): 9-12。